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理解农民中国

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美〕李 丹 著

张天虹
张洪云 译
张胜波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 东 主编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理解农民中国

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美]李丹著;
张天虹、张洪云、张胜波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5715-0

I. 理… II. ①李…②张…③张…④张… III. 农民—
研究—中国 IV. D4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8259 号

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Case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Copyright © 1989 by Yale Universit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2006-171

书 名 理解农民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的案例研究

著 者 [美] 李 丹

译 者 张天虹 张洪云 张胜波

责任编辑 张晓薇

装帧设计 刘葶葶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南门,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湖南路 1 号南门,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mm×1304mm 1/32

印 张 13.125 插页 2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5715-0

定 价 3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向我社出版科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讶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译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 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美国著名哲学家李丹(Dannial Little)教授(其简历请见李伯重先生的“中文版序”)有关中国研究的一部理论著作。李丹教授长期致力于哲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研究,近年来,他对中国研究十分感兴趣。在这部著作中,他从社会科学哲学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的中国研究,从方法论上进行了精辟的梳理和总结。

作为一名哲学家,作者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他对理性选择模型、文化相对论与社会普遍化(Social generalization)等理论研究颇深。更要强调的一点是,作者长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关著作参见李伯重先生的“中文版序”),是这方面的专家。作者宽阔的视野与深厚的理论修养为他探讨中国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本书中,围绕西方中国研究中的农业和农民问题,作者系统梳理了以下理论:有关小农行为动机的斯科特-波普金争论;施坚雅的中心地与巨区理论;分析中国经济史上的技术停滞与突破的科技论与分配论;解释19世纪中国农民起义的千年王国论、阶级斗争论与地方

政治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的争论。针对这些理论争论，作者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比较，不仅找出对立理论之间的分歧，发掘其各自的理论逻辑，而且往往能跳出这些争论，看到对立理论之间的联系和互补关系。

作为一名哲学家和理论研究者，作者没有停留在对这些理论的一般评介上，而是对这些理论进行系统梳理之后，站在社会科学哲学的高度探讨和反思中国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布罗代尔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者应该赞同这一观点。他强调：“要解释社会现象而不只是描述事件，理论就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这部著作体现着作者强烈的理论关怀。他明确反对理论的相对论和怀疑论，但同时就理论应该应用在哪个层次，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用中级层面的理论和概念分析具体情况而不是使用内容广泛的理论模型。为社会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是作者的诉求之一。在理论和方法论的总结中，作者涉及了因果机制、个人主义方法论、地方主义方法论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如何处理经验研究的问题，并对假设-演绎模型和社会科学中的客观性等热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特别强调“微观基础”(microfoundation)的重要性；宏观结论、集体性社会解释以及社会因果关系都离不开个体选择与个体行动层面上的微观基础。

近年来，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像作者这样从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的高度对西方中国研究的理论进行剖析、总结和反思的却并不多见。作者在书中实际上进行了跨学科的研究，体现了作者的宽广的知识背景与深厚学养。作者希望本书的阅读群体包括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哲学家等。我们也相信中国学者通过这本书可以进一步了解西方中国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农民的研究)的特点，进一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最后,作为译者,我们对翻译中的问题做一些简单说明:

1. 关于“community”。日本学者将其翻译成了“共同体”^①,中国学者以前多使用“农村公社”、“村社”、“井田公社”^②或“乡族势力”^③这样的概念。可见,关于“community”,目前还没有统一、确切的定义。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凡是遇到农村、农民的具体问题时,一般翻译成“村社”。如果原文是抽象地论述理论问题,则一般翻译成“共同体”。

2. “小农”还是“农民”? 原著中大量出现“peasant”、“peasant farmer”、“farmer”、“peasant cultivator”等词汇。我们处理的基本原则是:(1) 依据不同的语境做不同的处理,容易存在歧义和混淆的地方,一般都给出了英文;(2) 符合中国学术界的已有表达习惯,比如说“农民起义”而不是“小农起义”。

3. 关于“land-man ratio”。中国学者习惯于使用“人地比率”,但是这两者实为倒数关系,如果遵从原有的汉语表达习惯,则相应的其他表达都需要做相反的调整,反而会增添一些枝节。所以,我们遵从作者原来的顺序,凡是“land-man ratio”均译成“土地-人口比率”,而“man-land ratio”则译成“人地比率”,这样虽然繁琐了一些,但是尊重了原文并且不会出现歧义。

另外,原著引用的很多英文著述已有中文译本,对于这些中文译本,我们尽可能地做了参考。在此,我们对这些著作的译者表示感谢。文中凡是直接引用这些译著之处,都出了译者注,并注明版本信息。

① 参见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

② 参见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

③ 傅衣凌:《明清社会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5页。

献 给

罗尼、乔舒亚和丽贝卡

致 谢

本文的诞生难以离开许多亚洲研究领域内学者们慷慨的支持、建议和评论。在此,我特别要感谢:柯文(Paul Cohen)、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易劳逸(Lloyd Eastman)、周锡瑞(Joseph Escherick)、黄宗智(Philip Huang)、亨特(David Hunt)、约瑟夫(Bill Joseph)、玛祖达尔(Sucheta Mazumdar)、马若孟(Ramon Myers)、濮德培(Peter Perdue)、珀金斯(Dwight Perkins)、波普金(Samuel Popkin)、斯科特(James Scott)、维维安·苏(Vivienne Shue)、Tam Tai、瓦什布鲁克(David Washbrook),感谢他们在笔者撰写本书的各个阶段所给予的意见和建议。其他一些哲学家,包括:乔希·科恩(Josh Cohen)、佛兰纳根(Owen Flanagan)、哈丁(Russell Hardin)、波兰德(Jeff Poland)、迈克尔·泰勒(Michael Taylor)和温克勒(Ken Winkler),同样欢迎他们的意见和批评。感谢我在科尔盖特大学的同事比恩(Gloria Bien),她帮助我修改了初稿中所有中国地名的汉语拼音错误。感谢福格蒂(Tom Fogarty),他对本书第三章提出了许多意见。感谢多尔利(Laura Jones Dooley),他为本书提供了细致的编辑修改工作。

本书的大部分章节写作于我在卫斯理学院工作的两年半内。我衷心感谢该校哲学系同仁们的友谊和启发。还要谢谢科尔盖特大学和卫

斯理学院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及其休假项目所提供的研究时间。最后六个月的写作得益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科技历史与哲学项目的慷慨资助。

第二章和第三章曾经发表在《农业伦理学》杂志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thics*) 和《亚洲研究》杂志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上。第三、四、五章的一些版本曾经分别提交给费正清中国研究系列研讨班、新英格兰亚洲研究协会、新英格兰历史协会, 因此而收到的意见巩固了这些章节的论证。

中文版序

李丹(Daniel Little)先生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1939年出生,1971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获数学学士和哲学学士学位,197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获得博士学位后,他先后在科尔盖特大学(Colgate University)、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和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等校任教,并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任访问学者(1989—1991)。在此期间,他先后任科尔盖特大学教授会副会长(1993—1996)和巴克内尔大学副校长(1996—2000)。他现任密执安大学迪尔本分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Dearborn)校长和哲学教授,并兼任密执安大学主校(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Ann Arbor)的社会学教授。他还承担过美国全国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MacArthur Foundation)的项目。

李丹先生致力于哲学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的研究,认为学界可以从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跨学科对话中学到许多东西,因此其研究涵盖了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许多专题。他的主要专著包括《科学马克思》(*The Scientific Marx*, Minnesota, 1986)、《理解农民中

国》(*Understanding Peasant China*, Yale, 1989, 1991)、《社会解释的种类》(*Varieties of Social Explanation*, Westview, 1991, 波斯文版 1995)、《论经济模式的真实性》(*On the Reliability of Economic Models*, Kluwer 主编, 1995)、《微观基础、方法与因果关系》(*Microfoundations, Method, and Causati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1998)以及《贫与富的悖论: 描绘全球发展的伦理困境》(*The Paradox of Wealth and Poverty: Mapping the Ethical Dilemmas of Global Development*, Westview, 2003)。由这些专著的名字, 也可见其研究范围之广。他目前的研究目标是探索历史哲学的新方法, 力求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见解融合起来。他最新的著作是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中关于历史哲学的词条(这些词条可从<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history/> 获取)。多年来, 他一直积极参加美国社会科学史学会(th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的活动, 并且是美国亚洲学会(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和美国哲学学会(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Association)的活跃成员。

李丹先生对中国研究和今天中国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兴趣, 并从科学哲学和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 对西方的中国研究, 从方法论上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和总结。他去年曾应北京大学之邀, 到北大作了以《中国研究领域中的响声: 晚近欧亚经济史研究中的争论》(“Loud Voices in the China Field: A Recent Debate in Eurasian Economic History”)为题的专题讲演。在此讲演中, 他对国际中国学坛中的几大争论(对于民国经济状况的争论、关于内卷化的争论、关于加州学派的争论等)作了深入和精辟的分析, 使得学界对这些争论的认识, 达到更高的境界。去年他又应清华大学之邀, 到清华大学作了以《行动者、结构和社会偶然: 关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的新思维》(“Agents, Structures, and Social Contingency: New Thinking About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ocial

Sciences”)为题的演讲,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很重要的意见。

《理解农民中国》是李丹先生在分析和总结西方中国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本书出版后,受到学界的重视。各领域的重要学者纷纷对本书予以好评。P. Steven Sangren 在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v. 93, June 1991)、Edward Friedman 在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 41, Oct. 1992)、Alvin So 在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 20:1, 1991)、Tim Wright 在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 49:3, Aug 1990)、Marc Blecher 在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 85, June 1991)、Pauline Keating 在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housand Oaks: Jun 1994, Vol. 24, Iss. 2)发表的书评,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丹先生一直跟踪西方有关中国研究的进展,为中文版增添了两章,即中文版的第六章(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和第十章(社会本体论、因果机制与社会心态)。

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像本书这种科学方法论的作品实为少见。而史学研究者惟有具备科学方法论的自觉,才能使研究工作更上一层楼。因此,刘北成教授指导研究生将该书译成中文出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这将对我国学者更深入地了解西方学界在中国农民研究中的成就与不足、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分歧和争论等,都是一个积极的促进。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民,农民占了我国人口的大多数。从此意义上而言,今天的中国也还是一个“农民中国”。对于中国农民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中国研究的核心。西方学者在中国农民的研究方面具有其特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更好地了解西方学者的研究特点,无疑对我们的研究是一个推动。因此,我对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表示衷心的祝贺。

李伯重

2007年12月30日于清华园

目 录

译者的话 1

献辞 1

致谢 1

中文版序 1

第一章 前言 1

第二章 关于道义经济的争论 30

第三章 传统中国的区域体系 74

第四章 关于技术突破的争论 113

第五章 关于农民起义的理论 158

第六章 持续增长还是过密化? 204

第七章 概括及理论 245

第八章 解释 278

第九章 经验推理 311

第十章 社会本体论、因果机制与社会心态 336

引用文献目录 374

译后记 401

第一章 前 言

这是一部哲学著作,涉及亚洲小农社会内部的农业变迁问题。这种结合相当特殊,因而需要事先作些说明。为什么一个哲学家会写农民的集体行动、市场交易的等级体系和传统中国农业的停滞呢?最直接的回答是我是一个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这就意味着我所感兴趣的是社会科学逻辑的基本问题:社会现象的合理解释是什么?如何将理论模型应用于社会科学中?社会科学中经验推理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定量分析在社会科学中又起到了什么作用?等等。这些是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但我确信我们不应该在抽象领域,而应该在当前社会科学实践的背景中提出这些问题。因而我选择了一些当前社会科学中的争论并按照这些基础问题对它们进行全面考查。我希望这将能对我们理解社会研究的逻辑有所贡献。

这回答了上述部分问题。但并没有解释我挑选这些特定争论的原因;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哲学家,我可以通过研究社会科学中任何一组争论来实现目标。换言之,为什么我选择了农民和农业变迁而没有选择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胜枚举的其他问题?为什么是亚洲农民社会而非欧洲?我关注农业变迁源自这一题目固有的重要性。首先,我感

兴趣的是评估理性选择模型对社会解释的效力及范围。一般而言,理性选择理论的要旨在于:把各种社会现象解释为个体的理性决策和理性行为的总结果,认为这些现象由个体构成。这一模型被用以解释现代工业化社会中的许多问题,如选民行为、罢工和联合抵制、对公共物品(如公共电视)提供者的贡献水平等等。虽然很少有人从这一角度对农业社会进行分析,但是农业变迁看起来是一个颇有价值的试验案例。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农民所面临的各种选择显而易见:种什么作物、用什么技术、是否为村庄里的工程提供劳动、是否参加集体抗租、是否拥护起义的号召。对于农民通过选择,合理、努力完成其计划的这一行为,我们能了解到什么程度?像上述理性选择的总效果这样的农业现象,我们又了解到什么程度?

农业变迁这一主题吸引我的第二个原因是我以前对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科学的马克思》, *The Scientific Marx*, 1986) 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根据客观因素——如技术、阶级冲突、生产方式和社会的经济结构——理解历史变化的基础。这一模型已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欧洲资本主义的出现及发展。但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明显倾向于城市和工业化社会,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一直很少被充分地用于解释农业社会。(想想马克思将法国农民视为“一麻袋土豆”一笔带过。)然而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言,农业社会似乎是一个独特而有趣的测试案例。农业社会的经济关系简单,阶级体系清晰,而且技术(耕种技术和手工技艺)明显影响了参与者的日常生活。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真能随处适用,那么它应该能用于分析农业社会。能否将农业变迁解释为阶级冲突的结果?农业社会是否体现了“生产方式”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对农业变迁的研究,似乎突显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纲领的价值。

再次,通过关注农业社会,我希望能检验两个社会解释的一般模型:理性选择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两种模型仍在

应用但都需要尽力完善。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农业社会时处于最为不利的地位,它表现出的在农业变迁中仍在起作用的因果变量要比模型本身所预言的更为广泛。而且据此理论,在某些情况下,本该居于次要地位的社会因素(如血统和亲属关系)却第一位出现。农业变迁的世界比马克思主义预言的更为复杂多样。理性选择理论也同样面临着一个更为复杂的世界:小农的经济与政治行为是以人们所没有料到的方式受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理性思考的社会效果对思考时的制度背景更为敏感。同时,唯物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都出现了分析及解释农业变迁的富有成效的研究体系。

使我关注亚洲农民社会的最后两点。第一,我对文化相对论和社会普遍化的兴趣。有没有在超越文化边界的不同社会中起作用的社会进程?或者说,是否每一种文化及其社会现象都必须被理解为特殊的?我的假定是,模式化的规律可以跨越文化得到辨识,例如土地租佃安排对解释农村动荡的重要性。但似乎对我而言,思考这样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关注非西方社会,因为现有的解释社会变化的主流理论很大程度上仍是基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如果通过这些理论我们能确定一些亚洲社会中具有可比性进程的变化,那么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对跨文化规律的一个冲击。

第二点来自中国固有的影响和重要性(这里中国被视为亚洲的主要文化)。一个使罗马帝国相形见绌的古老帝国,一种超越中世纪欧洲的经济体制,一种早于欧洲文艺复兴的科学文化,一场社会代价远远高于可怕的美国内战的起义(太平天国),一场以一个代表千百万农民的政党最终取得最高权力的革命——对社会科学而言,中国所代表的类似于一个实验室。通过关注中国,有可能提出和讨论社会研究的几乎任何问题,并有可能在评估理论假定的基础上发现广泛的经验性资料。

我希望这本书面向以下几个群体。首先是那些对亚洲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们,包括中国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以及人类学家。